

新大众文艺兴起带来更多可能

边云芳

新大众文艺是对当下波澜壮阔的宏大气象、温暖细腻的人间烟火以及身边千千万万平凡的拼搏者、奋斗者喜怒哀乐、情感梦想的关注、表达和呈现。眼下,随着新媒体和人工智能的不断发展,技术门槛降低,自媒体兴盛繁荣。拿起手机就能写、能拍、能制作短视频,随时随地发表。人民大众更广泛地参与各种文艺创作与活动之中,不再是单纯的欣赏者,新大众文艺的兴起让创作走向民间、走向大众,人人都是参与者,人人都是创作者。巨变的时代改变了生活,也改变了文艺创作的主体、创作对象、传播路径以及评判尺度。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一个汹涌澎湃的文艺新浪潮正在滚滚而来。新大众文艺是一场创作者的革命。外卖骑手王计兵在送外卖的间隙写下一行行清脆的诗句;矿山爆破工陈年喜把诗歌写在了地层深处的巷道里;家政工范雨素在出租屋里以冷静幽默的笔调写下了人间的辛酸坎坷;打工文学的重要代表许立志深刻描绘了工业化流水线上青年人的精神世界;菜场作家陈慧白

天摆摊卖菜,晚上写作,已出版5部作品;泥瓦工张弯写出了百万字的作品;还有厨师、保安、木工、电工等平凡岗位上的劳动者……他们打破话语垄断,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表达自我、记录时代。他们的作品不追求华丽的技巧,不事修饰,直击现实世情,以“非虚构”的真诚和粗粝的生活质感打动人心,提供了观察社会的独特视角。同时证明了生活是文学的源泉,动人的故事和诗歌,就蕴藏在日常的、看似平凡的工作与生活中。比如王计兵那首广为流传的《赶时间的人》:“从空气里赶出风/从风里赶出刀子/从骨头里赶出火/从火里赶出水。”语言质朴,情感真挚,充满了对基层劳动者深刻的共情与关怀,感动了无数读者。

在新媒体时代,普通劳动者的创作能够让更多的读者看见,为大众熟知,获得众多粉丝。在与读者的双向互动中,他们更精准地捕捉和表达时代的情绪,超越了个体,获得集体认同。无论是小众领域还是通识普及,都有自己的受众。



当“乔盛文学奖”以超千人获奖引发热议,当各类诗歌奖动辄开出数十上百个获奖名额,文学评奖正在逐渐偏离表彰优秀的初心,沦为一场“皆大欢喜”的批量授奖游戏。这种“批发式颁奖”看似扩大了文学的覆盖面,实则在稀释奖项含金量的同时,消解着文学本身的严肃性与价值感。

设立一个文学奖,本意是树立一个专业的评价标杆,为读者挑选出那些真正有深度、有艺术价值的作品,也为创作者们提供一个值得努力追寻的方向。那些有影响力的著名文学奖,正是因为稀缺性赋予了奖项无可替代的权威性。而如今,部分奖项异化为“滥发”,获奖证书批量印刷,荣誉称号随手授予,使得奖项失去了筛选优劣的基本功能。

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种现象背后暗藏功利化倾向:有的奖项沦为商业营销的工具,借颁奖扩大曝光、拉拢资源;有的成为圈子人情的载体,“关系奖”“安慰奖”层出不穷;还有的将流量和销量作为评价标准,完全依据转发、点赞、阅读数据的高低来评定作品,让文学价值与市场数据被强行画上等号。

“批发式颁奖”的泛滥,正在对文学生态造成深层伤害。对创作者来说,当荣誉可以轻松获取,潜心打磨作品的动力便会被削弱,转而钻研评奖套路与社交运作,形成“重评奖轻创作”的浮躁风气。闻一多诗

歌奖部分获奖作品引发争议,便是对这种评价体系的无声质疑——当缺乏艺术质感的作品也能斩获大奖,真正坚守文学理想的创作者只会感到寒心与失望。

对读者而言,海量获奖名单让优秀作品淹没其中,难以辨别真正的文学精品,久而久之便会对获奖作品失去信任,文学奖引导阅读、传播经典的功能也就无从谈起。更严重的是,这种“人人有奖”的模式会弱化文学的精神分量,让文学从“语言荒野中开凿思想隧道”的严肃事业,降格为追求热闹的娱乐活动。

文学需要传播,但不应以牺牲价值为代价;文学需要包容,但不能放弃专业的评判标准。挪威“慢电视奖”鼓励反流量创作,德国图书奖专设“未被发现的杰作”单元,这些实践证明,文学奖的生命力在于坚守初心而非迎合市场。要遏制“批发式颁奖”的乱象,首先,需要明确评审规则并透明公开流程,让专业评委而非商业利益或人情关系主导评选;其次,要坚守宁缺毋滥的原则,让奖项回归表彰优秀的核心功能,而非充当“按摩器”“营销工具”;最后,整个文学界要重建对价值的敬畏,让创作者明白,真正的荣誉,不在于拿了多少奖,而在于你的作品有没有一个能打动人的灵魂,文字能否像星光一样,永远发光。

文学奖的初衷,在于激励真正的创作,而非提供批量的慰藉。它必须回归纯粹,恪守专业标准与价值底线。只有这样,文学奖才能重获信赖,让文学在纷繁的时代里,依然葆有它那份尊严与力量。

双塔

李丹宇

金庸作为新派武侠小说一代宗师,其作品的影响力有目共睹。小说中,他为故事和人物活动设置的地理空间极为广阔而丰富。值得关注的是,小说写到许多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长城关隘,山西的雁门关、娘子关、龙泉关,河北的山海关,北京的居庸关,甘肃的嘉峪关,等等,都曾出现在其笔下。尤其在巅峰之作《天龙八部》中,金庸先生将雁门关作为建构小说错综复杂的情节和人物关系的重要描述对象。雁门关不仅是小说中主要描绘的景观,而且是整部小说故事情节的轴心。对于从未到过雁门关的金庸来说,将故事的地理背景和情节枢纽设定在雁门关,应该不是随意而为,而是他在充分考虑了雁门关的自然特征与文化内涵以后作出的选择。

从文学叙事层面上看,金庸选择描写雁门关的作用首先在于满足小说创作的基本需要。雁门关是中国古代塞内与塞外、中原与漠北、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交界地带,在宋代曾是宋辽对峙的前沿。《天龙八部》既然以宋辽对立的乱世时期为背景,就不能不写雁门关。小说第二十回正面叙写了雁门关战略位置的重要性:“雁门关是大宋北边重镇,山西四十余关,以雁门最为雄固,一出关外数十里,便是辽国之地,是以关下有重兵驻守。”

金庸还在《天龙八部》中具体描绘了雁门关高耸险峻的特征,详细交代了雁门关的方位、名称由来、自然地形地势和军事战略地位。“雁门关在代州之北三十里的雁门险道。”“雁儿南游北归,难以飞越高峰,皆从两峰之间穿过,是以称为雁门。”再通过乔峰提到赵国大将李牧和汉朝大将到都曾在雁门关抵御匈奴入侵,间接地说明雁门关所处地理位置的险要。

然而,金庸笔下的雁门关书写绝非仅仅停留在表层意义上的小说时间、环境等要素的设置。《天龙八部》篇幅之巨,人物之多,人物关系之错综、故事线索之繁复,当属金庸作品之最。令人称奇的是,其中雁门关是整部小说故事的主要发生地,故事的开始、高潮和结尾的重要情节皆与雁门关相关联。金庸在细致描绘雁门关地形地貌和战略位置基础上,将主要人物置于其中,表现人物所遭受的矛盾冲突以及自我身份的艰难转换,立体构建了雁门关文学地理空间。小说中的雁门关已经不只是客观存在的一处自然地理景观,而转化为具有文学空间叙事功能和隐喻象征意义的文学地理空间。它既是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一条重要线索,又是表达作品旨意的故事内容载体。

《天龙八部》中主人公萧峰一生命运的转折节点都发生在雁门关。小说开始叙及的核心冲突事件发生在雁门关,即玄慈等被慕容博故意散布的假消息欺骗而在雁门关伏击萧远山一家。萧远山夫妇深感自尽时,将婴儿萧峰投上悬崖,致使生于契丹的萧峰后来在中原长大。成年后的乔峰又因当年的雁门关事件遭中原武林人士唾弃和追杀,乔峰自我求证身世之谜的过程中与阿朱在雁门关确立刻骨铭心的爱情,乔峰把名字改回本名萧峰,二人相约塞外放牧,携手继续追查真相。不料,阿朱被萧峰误伤致死,“塞上牛羊空雪约”。由此衍生出萧峰遵从阿朱遗愿照顾阿紫、阿紫跟随萧峰前往辽国等情节。萧峰进入辽国之后结识辽帝耶律洪基,因协助耶律洪基平定上京叛乱而被封为南院大王。耶律洪基决意征伐大宋,小说的情节高潮也是故事结局重新在雁门关上演。雁门关前耶律洪基率辽军为阵,千钧一发之时虚竹、段誉智擒辽帝,萧峰借机威迫耶律洪基答允:“……立即退兵,终陛下一生,不许辽军一兵一卒越过宋辽疆界。”自己则舍生取义,用两截断箭自尽罢兵。悲痛欲绝的阿紫抱着萧峰的尸身跃入雁门关前的万丈深谷,双双魂归雁门。

金庸在小说叙事过程中巧妙而缜密地运用雁门关空间,将作为空间维度的地理叙事和作为时间维度的情节发展融为一体,既使故事叙述得曲折离奇,又使萧峰这一侠义形象塑造得光彩照人,还使小说的主旨意蕴丰富多元。雁门关不单是《天龙八部》故事发生的地理背景,还是对构建金庸小说江湖世界具有重要的叙事功能与意义所指,通过雁门关这一叙事媒介,可以了解其中传达的文化底蕴以及文化精神。

中国古代历史上长城既是民族冲突交战的前线,也是民族交往、文化融合的重地。经过漫长历史的淘洗和沉淀,雁门关承载着中华民族融合过程的历史信息和轨迹。而文学家对某一地理空间的独特生命和内在精神有了深刻认识,必然会对此地理空间内人民的文化精神有深入透彻的理解。反过来,理解了这一方土地上人民的文化精神,也就更深刻地参透了这片神奇土地之文化意蕴。

前文已述及,金庸因写民族冲突之地的故事而选择处于民族分界线上的长城关隘,又因小说历史背景设定在宋辽时期就不能不写纠合着宋辽之间激烈民族矛盾的雁门关,但比这些叙事功能更重要的是金庸用文化的眼光来审美地理景观,他书写的雁门关已直接关联到其积淀的历史文化内涵。因此,金庸笔下的雁门关这一文学景观也具有了和平交融的象征意蕴。由此看来,《天龙八部》背景和故事场景的选择不仅是为了便于作者驰骋文学才情,还彰显了作者关注国家兴亡、阻止民族战伐的思路,更折射出一种民族融合与和平相处的希冀。

自小在中原长大的契丹人萧峰以死谏停宋辽之战,作者消弭民族对立、反衬民族和睦重要性的创作意图是鲜明的。金庸在《“金庸作品集”新序》中明确谈过他所希望表达的主旨就是民族间相互尊重、和平友好、互相帮助”,虽然这不是单就《天龙八部》而言,但从中可窥见作者所表达的向往民族平等、民族融合的主题倾向。这种中华民族和合文化中折射出的中国人崇尚和平的民族品格,也体现在长城文化中。《天龙八部》则是金庸最能彰显其创作意图和长城文化意蕴紧密结合的作品。

沉潜于大地的精神跋涉

——诗集《我愿埋首人间》的意象

王夏柯



《我愿埋首人间》(湖南文艺出版社2025年8月出版)是诗人张二棍的诗集新作,书名源自其短诗《六言》中“因为苍天在上,我愿埋首人间”一句,全书共包含12个小辑。诗人18岁成为地质队钻工,常年在野外行走,跋山涉水。在诗集中,诗人贴近渺小而平凡的生命,以笔触描摹流动的过往与内心的幽微,将世间“柔弱的生命”在“空茫的人世间”中的痕迹实现温情的展现。

张二棍以一位漫游者的身份,踏入一场沉潜于大地的精神跋涉。在《黄土高原风成说》中,他以“风”为笔,勾勒出黄土的堆积与吹散如何同时完成对先人的村庄和文明的构筑与埋藏。而在《村小》一诗中,他则从“无色无相的大先生”“一粒粉笔”与“争辩的麻雀”等细微意象中,提炼出乡村教室所承载的文明重量与存在之思。在《旷野》一诗中,“旷野”从现实的途经地升华为诗人关于生存的思考场域。诗中的“我”与“灰兔”作为两个孤独的生命体,其互动通过“红红的,值得怜悯的眼睛”完成了从视觉到语言呼唤,直至精神相拥的深刻共鸣。在此,主客体对立模式瓦解,变成有联系的个体,以孤独对抗孤独,从而消解孤独。在诗中出现的黄土高原、乡村、旷野等地理意象,浸润着诗人的灵魂,落在纸上,时刻引导着读者进行精神漫游。

诗人常将目光聚焦边缘群体,观照他们努力生活的姿态。他书写“侏儒兄弟”要咽下更多的苦才可以生存(《我的侏儒兄弟》)。正如张二棍所说:“我们要发掘人性最单纯而耀眼的部分,我们要记录下泱泱众生,在他们生存中的那些坚强、宽容、救赎、彼此关怀的瞬间,我们要让大家的生命里拥有各自的尊严、勇气与理想。”在《穿墙术》中,诗人以超现实笔法书写母爱,没有直白的赞美,而是通过一个极致的想象,将母爱最深沉、无私与隐忍的情感展现得淋漓尽致。这一切的人与事都那么坚韧、干净,又饱含生活的汁液,体现了诗人的构思奇特。

温情和爱并不局限于“人类”这个物种,张二棍对所有生灵都有一颗虔敬之心。作为一位常年游走在荒野山林的地质队员,张二棍是谦卑的,他对于自然界的动植物都有着深刻的情感共鸣和生命感悟。《山村里里的树神》写“柳树”,诗人以近乎白描的笔法,让神树、村民与乡野自然交融,使诗歌达到一种返璞归真的质朴境界。《暮色空》写“夕阳”,诗人想象“夕阳”将云彩作为新衣赠予倔强生活的人们,对第二日的“明天”充满希望,这夕阳会“义无反顾”地宽恕、原谅一切。从清晨到日暮,从羊群到蚂蚁,从大风到大雾,诗人俯下身来观察那些生命细

节,并把动植物与人性联系到一起,将自己的情感倾注于自然万物,形成一种朴素的“物我交融”的诗歌境界,达到人与外界和谐统一的哲学高度,为读者构建了一个可以置身其中的“共情”空间。

在诗集中,“小屋”的设置尤其值得关注。在这一独特的意象中,承载了诗人对抗虚无的精神家园。在《有间小屋》中,张二棍幻想“小屋”要有“秋阳”“竹竿”“一从花”,幻想“丫头”在屋子旁的桑树上玩耍,等着“我披着暮色归来”。他笔下的“小屋”书写类似于《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一诗中描绘的“明天”。他的“愿以小屋兼济天下”的人文精神和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济世思想有着共通的现实关怀意义,体现着士人襟怀。小屋虽小,但诗人仍欢迎两手空空的“赶路人”在天青地白之时,可以进去暖一暖,然后继续向着未竟的事业、未完的旅途前行。“小屋”不仅安顿了诗人自己,也为所有在现代化洪流中感到漂泊无依的“漫游者”们,提供了一种诗意的启示:真正的栖居,不在于逃离人间,而在于深爱其中一片瓦砾,并以内心的权利,在其中为自己筑巢。

漫游世间、洞彻生活真相之后,依然选择热爱生活。在当下的时代,张二棍的诗歌以独特的审美追求和精神世界,成为诗坛的特殊存在。他的诗歌用直白式的顿悟,给读者读罢久久不能平息的震撼。他的诗歌的可贵之处在于摒弃了孤高自赏的避世姿态与矫揉造作的情感态度,发散“人间烟火”的气息。其中夹杂着质朴真挚的情怀,这就注定了他的文字将持续触动我们每个人敏感而纤细的神经。真正的诗意不在于远方,而在于我们如何扎根现实,并在此处向一切生命投以最深情的敬仰。

《聊斋志异》把文学的主体性发挥到了极致。文学当然是生活的反映,但是反映出来的是文学,不是仅仅记录、照相、录音,文学不止于镜像,而是加上了主体的价值与信仰,判断与追求,感受与情思,思索与梦幻,语言的韵律修辞节奏秦变调、对仗、层次、文学的典型化、戏剧化、抒情化、象征化、创造化,等等。

——王蒙

正的有价值的东西。哪怕所有的人把阅读变成了一个无限轻松的游戏与消遣,我依然要说,同行们,我们不能这样,我们还是要刻苦地、用功地、费力气地去作乙方。读物的质量是乙方的尊严,也是甲方的尊严。手机阅读时代,这样的尊严更需要被重视。

——毕飞宇

